

“社会剖析派”的诞生

——从“自然主义”向“写实主义”嬗变的茅盾

李建东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茅盾是有着纪录中国社会的“宏大叙事”理想的作家,又是致力于引进西方文艺思想的理论家。他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引进,目的是吸取一种注重“实证”的近代科学精神,并且不着痕迹地完成了由理性世界向感性世界的过渡,创作了显示左翼文学实绩的《子夜》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在实践上印证了中国式的“写实主义”,催生了社会剖析小说流派的诞生。

关键词:茅盾;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社会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2-0040-04

作为一个重要的现代小说流派,“社会剖析派”的主要代表无疑是茅盾。他从“五四”时期自觉地引进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到左联时期批判“革命的罗曼蒂克”,直至建立社会剖析创作理论,催生中国式的“写实主义”,而且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的主力军。这些都可以从茅盾早期文艺思想的嬗变中找到端倪。

一

人们历来认为茅盾是一位罕见的极富理性的文学家,这些与他有担当着翻译家、文艺理论家的多重角色是分不开的。但这又不是唯一的理由,与他同样担当多重角色的作家并不鲜见,而浪漫的诗性光辉,常使他们沉浸于感性的大淖,并不能展现一种异于一般作家的独特秉赋和气质。而茅盾却不是这样,他能很沉静很自然地从事翻译家嬗递于文艺理论家,也能很沉静很自然地从事文艺理论家嬗递于艺术家。而且于文学创作园圃,他类似于鲁迅——大器晚成。虽然他成名于《蚀》三部曲时,不过32岁,但在那时与更多的20岁出头的青年作家相比,还是稍嫌老成了一些,而且是半路出家。但这些都没有成为他的赘疣,恰恰相反,能使这位已经颇有名气的文坛“老将”,一出手,便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强劲实力。尽管《蚀》三部

曲,为他带来了疾风骤雨般的争议乃至攻击,使他不得不由“牯岭”到“东京”,但其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并非能轻易抹杀掉的。

紧随其后,他致力创作了长篇小说《子夜》,不仅代表着左翼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是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当时它的出版就成为三十年代初我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朱自清说:“近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1]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茅盾是一位真正致力于描写与剖析中国现实社会的小说家。也可能受到西方大作家的影响,茅盾早就有着叙写中国社会的宏大事件并上升为宏大主题的愿望。

茅盾的“宏大叙事”,与他早年受到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有一定关系。当年茅盾之介绍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从文学进化的观点出发的。他虽肯定今后中国新文学要走新浪漫主义道路,但他又认为“走路先得预备。”他将自然主义当作文学发展中必经的一个过程,明确指出“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那么,就文学进化的通则而言,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亦是免不得要经过这一步的。”^[2]在茅盾看来,当时中国的新文学显然尚未达到搞新浪漫主义的阶段,必须让自然主义出来,并吸取自然主义的技

收稿日期:2010-05-11

作者简介:李建东(1958-),男,山西晋城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艺学。

术,也可以进一步为建设新浪漫主义文学创造条件。在这里,茅盾的主张可谓用心良苦,按照西方文学发展的路子依次走下去,也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文学的发展,与作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社会因素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西方文学的若干发展阶段,不一定完全能够重现于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中。就像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被引进至中国,只能聊备一格,而难以蔚为大观一样。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也证明,自然主义催生写实主义并与之合流,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历史的必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找到回应。比如,滥觞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主义”,“对于贫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他们“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3]可见,自然主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种“主义”的提出,这对本来尚属“合理”的一面走火入魔,极尽夸张之能事,却又权当别论了。

茅盾的创作思维是动态而多元的。他从左拉的自然主义那里,真正吸取的则是一种近代的科学精神,并把它称之为是科学的自然主义。“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是客观的观察。”^[4]一段时期内,我们常常对茅盾早期的“自然主义”倾向有所非议,其实大可不必。茅盾早年的文学思想倾向与他中年时期的一系列文学创作实践,并非一回事,就像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与他的在主体上属批判现实主义的鸿篇巨制也不是一回事一样。其实,左拉一贯推崇的则是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在《论小说》中指出:“没有人居然把想象力赋予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描绘了自己的时代,而非因为他们杜撰了一些故事。”^[5]因此,对左拉的偏爱,不仅没有使得茅盾陷入自然主义的大淖之中,而且使他更注重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他不满足于“中国古来文人对于文学作品只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也不满足于“五四”文学着重表现的婚姻家庭恋爱的倾向,他渴望文学能够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他认

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6]

二

但“自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只有经过中国式的文艺理论及文艺思想的改造,才能融为新声。其实,自上世纪20年代末,茅盾已经认识到“自然主义”在中国文坛上的艰窘,这样,起于“现实主义”之先的“写实主义”,也就应运而生。1929年5月,茅盾继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又发表了《读〈倪焕之〉》,详细论述了他的“写实主义”的文学观点。特别是针对当时备受创造社“小伙计”(对后期创造社诸子的谑称)围攻的“厌世家”叶圣陶所塑造的小资产阶级的形象,给予了科学的解剖与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对“留声机器”式的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偏激理论以善意的批评。如果说,早期创造社诸子是“遭遇文学”的话,那么以翻译与批评为己任的早期茅盾,也是“遭遇文学创作”,因为他在早期并未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名具体于创作实践的小说家。这样,当他一旦成为一名小说家,抑或说成为一名颇为受人瞩目的小说家的时候,便已经不自觉地是一名并不多见的具备了坚实的理论素质的小说家了。这一点运用到茅盾身上,并未成为他的短处,反而成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长处,使他能够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严谨的理性思维,投射进经过转型了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并顺利地不着痕迹地完成了由理性世界向感性世界的过渡。他认为文学家认识与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与任务。和一般社会科学家是相同的,但借以完成这任务的方法却是不同的。“社会科学家既缜密观察,分析而综合,指出了如此这般,便可谓能事已尽;文艺家则于得到了如此这般的‘结论’之后,还得再倒回去,从最初的出发点再开始,从纷纭的表象中,拣出其最典型者,沿其发展之迹,用艺术的手腕表现出来。”那么,这种“艺术的手腕”究竟是什么?就是在独特的观察、选材与构思过程中,先“由具体到抽象,由表象到概念,而后复由抽象回到具体,由概念回到表象。在这回归之后,才是创作活动的开始。”^[7]

浪漫的诗意,是任何小说家都须具备的。不同的是,有些小说家是以情提升,有些小说家是以理酿化,尽管后者仅占少数,而茅盾正是这少数之一。这与他在创作小说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厚实

的中外文艺理论的储备与历练是分不开的。他在为华汉《地泉》重版作序时,就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更全面地诠释自己的文学观念。

我的中心论点是: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地根据了他所获得的对于现社会的认识,而用艺术的手腕表现出来。说得明白些,就是一个作家不但对于社会科学应有全部的透彻的智识,并且能够懂得,并且运用那社会科学的生命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去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他的动律和动向;并且最后,要用形象的言语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从这些现象中指示出来的途径。所以一部作品在产生时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 (一) 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
- (二) 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8]

这一点,又可以看到泰纳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对茅盾的深刻影响。他不仅强调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而且肯定“社会环境对于文学的无可争议的力量。”“茅盾对于社会背景的强调,不仅使他和创造社的‘自我表现’区别开来,而且与同是‘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也构成了明显的区别。周作人的‘人’是原子式的生物性的人,而茅盾的‘人’则是‘社会的生物’,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9]因此,茅盾对他所处在的五彩缤纷的当下文坛,是充满着信心的。“我们已经从事实上证明环境对于作家有极大的影响了,我们也从学理上承认人是社会的生物罢,那么,中国此后将兴的新文学果将何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咧。”^[10]有论者评价茅盾是政治小说家或社会政治小说家,虽然不无揶揄之意,但也基本是准确的。就连当时为《子夜》大唱赞歌的瞿秋白也不回避这一点,“有许多人说《子夜》在社会史上的价值是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这原因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我们看见社会辩证法的发展,同时却回答了唯心论者的论调。”^[11]正是如此,“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12]这与左翼文学初期“革命的罗曼蒂克”的文学思潮,在行进期间,就已经受到清算有一定关系。而首领其功的当属善于纠偏扶正,既是小说家又是理论家的茅盾。

三

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系统的文艺理论的知识储

备,虽然茅盾一向钟情于“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一向声明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定茅盾实践于创作中的“题材决定论”。恰恰相反,茅盾认为有了重要的题材之后,还要看作者是否能以先进的世界观和科学的头脑去认识、分析、处理这些题材。他曾以余上沅的剧本《兵变》与《回家》为例,说明由于作者“并没有把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解剖刀”去分析社会,不能以革命的思想去认识生活,而使用那本来“能够反映全般社会现象的题材”变得“异常狭小”,甚至和总的社会生活“脱离了关系”^[13]可见,理论的储备不能说不是茅盾的一大长处,问题是他能够将知识转化成一种能力,而这转化的过程,则是一件更为艰辛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五四”至三十年代的作家,特别是有较大成就的作家,都有着深厚的外国文学的储备。过去我们常说的他们的作品常有着“欧化”的痕迹,使得不少人往往从语言层面去寻找。其实,所谓“欧化”的痕迹,更多的不是语言,而是组织结构的方法、选择材料的标准、提炼主题的手段等等,这些更为内在的因素。茅盾受所谓“欧化”的影响应该说是“颇深”的。他热爱左拉、巴尔扎克、司汤达,他更热爱以写“大题材”见长的托尔斯泰。“托翁作品结构之精密,尤为钦佩。以《战争与和平》而言,开卷第一章借一个茶会点出了全书主要人物和中心故事,余后徐徐分头展开,人物愈来愈多,背景则从圣彼得堡到乡下,到前线,回旋开合,纵横自如,那样大的篇幅,那样多的人物,那样纷纭的事故,始终无冗杂、无脱节。……我觉得读托翁的大作至少要做三种功夫:一是研究他如何布局(结构),二是研究他如何写人物,三是研究他如何写热闹的大场面。”^[14]这些经典作品的艺术滋养都贯彻到茅盾的创作实践中,以此来弥补政治理念过强的不足。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以茅盾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们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文化思潮的迷惘与困惑。以理性思考见长的茅盾也深知这一点,他后来回忆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

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15]这种夫子自道,是当时尚显年轻的作家们苦于选择并感到矛盾、彷徨的主要心理背景。因此,他们需要静下心来,做一些于国于民、于文学事业有益的踏踏实实

的工作,那就是找出中国残破现状的阶级根源和政治经济根源,并剖析这些根源。于是,穿越“自然主义”,跃升到“写实主义”的社会剖析小说派得以诞生。

参考文献:

- [1] 朱自清. 子夜[J]. 文学季刊, 1934, 1(2): 页码不详.
- [2] 沈雁冰. 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J]. 小说月报, 1922, 12(12): 页码不详.
- [3]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40.
- [4] 茅盾. 文学与人生[M]//茅盾. 茅盾全集. 18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126.
- [5] 左拉. 论小说[M]//朱雯.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205.
- [6] 沈雁冰. 社会背景与创作[J]. 小说月报, 1921, 12(7): 页码不详.
- [7] 茅盾. 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M]//魏绍馨.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8: 219.
- [8] 茅盾. 《地泉》读后感[M]//地泉. 上海: 湖风书局, 1932: 21.
- [9] 旷新年. 1928, 革命文学[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332.
- [10] 沈雁冰. 文学与社会政治[J]. 小说月报, 1922, 13(9): 页码不详.
- [11] 瞿秋白. 读《子夜》[N]. 中华日报·小贡献, 1933-08-13(14).
- [12] 瞿秋白. 《子夜》与国货年[N]. 申报·自由谈, 1933-03-12, 版次不详.
- [13] 茅盾. 读《上沉剧本甲集》[M]//魏绍馨.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8: 220.
- [14] 茅盾. “爱读的书”[M]//茅盾. 茅盾全集. 22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76.
- [15] 茅盾. 我走过的路[M]//茅盾. 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心路/自述篇.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16.

The Birth of “Social Analysis School”

——Maodun's Transmission from “Naturalism” to “Realism”

LI Jian-dong

(Author's Working Plac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Maodun is the writer who has the “grand narrative” ideal with the Chinese society recording, and the theorist also keeps trying to introduce the western literary into China. His introduction about the western “naturalistic” literary trend, which has the purpose to draw one kind of “empirical” modern scientific spirit, and with no trace to finish the transition from reasonable world to the sensible world, and has already created a series of literary classics which show the left-wing literary achievements such as *Midnight*. At practice of proving the Chinese “realism” novel, it gives the birth of social analyzing schools.

Keywords: Maodun; natural socialism; realism; social analysi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